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回顾与根本经验

何龙群　李建忠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党。紧密结合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教育全党同志尤其是各级干部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研究，是我们党 70 年来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保证。回顾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历史过程,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党的各项任务的完成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将是十分有益的。

一

造就一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保证其取得胜利的先决的重要条件。因此，始终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自己的党员，就必然成为无产阶级政党保持其先进性和实现革命目标的重要任务。

回顾我们党的历史,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一以贯之的,但其间也有过曲折和偏差。从总的发展情况来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段。

第一阶段,从建党至 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以前，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初期阶段，由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久和当时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广大党员主要在实际革命斗争中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和教育，专门的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尚少。当时，党内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过分强调理论而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以为只要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十月革命经验搬到中国来，就能解决中国问题；另一种是过份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以为单凭革命热情和实际工作经验，就能使革命成功。尽管我们党从“四大”以后逐步提出一些加强理论教育的要求，并通过发党刊、办学习班进行一些教育，但还没有自觉地把加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看成是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完成革命任务的一个主要手段。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连续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的教训，使一部分同志开始从革命成败的高度认识了掌握正确理论的重要性，并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教育党员。1929 年,毛泽东起草《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出了必须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人民军队的主张。1930 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强调“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并初步提出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批判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错误态度，开始显示出我们党要把马克思主义既当作一种世界观，又当成方法论来教育党员的重要特色。尤其是遵义会议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党员和干部，已成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风气开始在一部分同志中浓厚起来。

第二阶段,从 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到 60 年代前期,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已走上正轨，能正常地结合各个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组织专门的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规模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延安整风时期。1938 年 10 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第一次号召全党自上而下一致地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①。1941 年 7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各项建设的首位。1942 年整风学习开始后，形成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中央指定 22 个文件作为党员干部的学习材料和考试范围，目的在于弄清建党以来思想、政治、组织路线上的是与非。整风运动从思想理论上批判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确立了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创造了我们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整风形式。中国化、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此成为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崭新的重要的内容。"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成为"七大"新党章明确规定的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各种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院校也相应地建立起来，毛泽东、刘少奇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亲自在延安窑洞的课堂里，向来自前线和敌后的党员干部和热血青年，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讲解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培育出一批又一批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治党、治军、治国的优秀人才，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可靠保证。

第二次是建国初期。为迎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适应革命转变的需要，1949 年 3 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要对党员和干部进行一次社会发展史和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并规定了要学习《社会发展史》等 12 本马列主义著作。这 12 本书，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一直是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1951 年 2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规定从今以后全体党员要在统一的制度下无例外地和不间断地进行马克思列

①《中国共产党历史重要会议集》(上)，第 218 页。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系统的学习。1955 年 7 月,中共中央又下发了《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办法的规定》,确定在 5 年内将参加理论学习的高级干部,一半分批地进入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另一半则实行在职自修,以提高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1956 年 2 月中央又下发了《关于加强初级党校工作的指示》,目的在于把初级党校办成轮训党的初级领导骨干的基地。所有这些,为在全党正常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制度上作了保证。而这些教育活动则从思想上武装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党走上执政地位作了思想准备,为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第三次是‘大跃进’以后直到 60 年代前期。1958 年“大跃进”出现了严重失误,毛泽东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建议他们读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以澄清当时的混乱思想。1963 年,毛泽东又提出干部学习马列著作的任务,选定了 30 本马列的书,以便用马克思主义总结社会主义建议的经验和教训,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新的实际问题。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教育,对于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又走上健康协调发展的道路,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阶段,即‘文化革命”10 年,这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出现偏差的时期。表现在指导思想上脱离了党长期以来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轨道,把马恩列斯的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简单化。尽管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尤其是在陈伯达、林彪反党问题揭露之后,号召全党学习唯物论,批判天才论,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但是,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因而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

以“反修”“批资”为主要内容的脱离当时中国实际的理论教育,不仅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第四阶段,粉碎“四人帮”以后至今,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优良传统得到恢复和开始正规化。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要求，党先后组织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学习和讨论，关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学习,《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的学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学习，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等等。1984 年,中宣部作出了关于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正规化的规定，在恢复和建设好各级党校及省、地两级党委干部理论教育讲师团的基础上，使上百万干部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几门基本课程。无可置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教育是卓有成效的。然而，由于后来一段时间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忽视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和影响，马克思主义曾一度受到冷落，党员、干部的理论教育也遭到削弱，造成了思想理论上的混乱。1989 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着手纠正这一失误，把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看作是提高“党的领导的正确性、科学性的根本保证”①，看作是全党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突出的战略任务，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教育，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普遍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形成了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气候，推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由上可见，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①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育的工作逐步得到重视和加强，并愈益摆在首要的地位，尽管出现过曲折，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上加强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却始终是主流，并发展成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其教育方式也逐步由分散、单一、随意到统一、多样、规范，教育内容也由零碎、简单、片面到完整、准确、系统。

二

总结我们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理论与实际结合，寓教育于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之中。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俄国曾经经过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许多介绍、翻译、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思想理论准备阶段不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便是作为指导行动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的。原因有三，一是国际环境已从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时期进入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激烈动荡的新时代；二是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中国革命环境，不允许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长时间学习和研究之后，再去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三是绝大多数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在参加革命时不仅没有学过什么马列理论著作，连识字也不多，要让他们像进学校那样以规范化的方式按部就班地去学习理论著作，熟悉理论知识，然后再参加革命，这是不实际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干中学习，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同时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党员干部的重要方法。这种特色具体体现在：其一，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时，强调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以之来解决中国问题。尽管有些党员由于文化

条件限制，对马列著作中的一些具体的概念、知识、材料一时还搞不清楚，但只要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的方法论，就能够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作用。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特有的传统表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上的独特创造。它弥补了我们党理论准备较差、党员干部文化素质偏低的弱点。其二，教育党员干部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必须重视对中国的社会状况进行实际的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揭示中国社会的特点，找出其规律性的东西，探索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党的领导人毛泽东一贯重视调查研究，早在 1929 年，就提出“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① 后来又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② 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成为全党同志的楷模。其三，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主要形态的主观主义。在党的历史上，以脱离客观实际为特征的主观主义，不仅曾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使中国革命濒于绝境，而且在一个时期几乎禁锢了党的思想，形成了一种对本本的迷信。我们党要探索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就不能不强调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扫清这种结合的障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不能不强调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其四，把学习马、恩、列、斯的思想与学习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革命的指南，为我们指明了达到理想彼岸的道路。但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不能只靠一般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毛泽东思想正是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9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09、115 页。

这种结合中产生和发展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包含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战略和策略。把学习马、恩、列、斯思想与学习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就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找到了在中国的落脚点。全面深刻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就是最生动、最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总之，党建立以来 70 年的发展过程，一方面是我们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马克思主义和它的世界观的影响日益扩大和深入人心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两方面结合的结果，不仅使我们党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和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且培育出一大批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家。在这种结合中，马克思主义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不断得到发展，党本身也日臻成熟起来。

第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个人世界观的改造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资本主义很不发达，工人阶级占全国人口比重较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如此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力量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以农民、小资产阶级为同盟者，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内非工人阶级出身的党员很多，而且，这种状况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的一个时期内不会改变。这样的“党情”给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出了一个极其艰巨又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众多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培养成为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真正的工人阶级先锋战士；即使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党员，也有一个学习提高的问题。否则，就会影响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并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因此，与其他共产党主要通过从组织上清除

出党的途径来巩固队伍、纯洁组织的做法不同，我们党是在注重从组织上严格治党的同时，更注重从思想上建党，非常重视党员的世界观改造和党性锻炼。这是我们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又一突出特色。

改造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它包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离开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主观世界的改造就无从谈起，而不重视主观世界的改造，也就实现不了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我们党重视世界观改造和党性锻炼，就是经常教育党员“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①]，以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忍辱负重,任劳任怨 严以责已,宽以待人 诚恳坦白,团结群众 忠心耿耿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的、高尚的、纯粹的和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先锋战士。这种世界观的改造和党性锻炼的主要方式为：其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这包含了一个自我教育和相互教育的过程。一方面，要求自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改造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检查和克服自己精神世界中种种污浊、肮脏、自私自利、争名夺利、自由主义等等旧思想，为人民的利益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的。另一方面，进行同志间的相互监督和相互帮助，既敢于和善于批评别人的缺点和错误，又乐于和敢于接受别人的批评，以达互相促进。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处理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解决党员思想上入党的问题，这是我们党创造的进行党的思想建设的正确方法和有效途径，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其二，教育党员、干部向社会和实践工作学习，在深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21 页。

入社会和工作实践中，通过与工农群众的接触和对实际情况的了解，修正自己思想中与客观实际不符的认识，同时把自己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在社会和实践中磨炼、洗涤和净化自己的精神、灵魂。其三，严肃党的纪律，严格执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坚决肃清无政府主义思潮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以保证党的统一和战斗力。这些思想改造和党性锻炼的教育活动，确实极大地提高了党员自觉的革命意识，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信念和斗志，极大地推动了革命实践活动。党内涌现出一大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优秀干部和党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无数的共产党员，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在权与利的引诱前，不为所动，高风亮节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勇于牺牲个人的一切。其根本原因，正是由于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注重了党性的锻炼。而这些年来，一些党员、干部在政治风波中立场动摇，迷失方向，或者在对外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中被金钱俘虏，腐化堕落，从根本上说，都是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放松世界观改造的结果。

第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结合起来。党的团结和统一，是我们党战胜困难，完成革命和建设任务的根本保证。但这种团结必须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是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上的团结。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斗争目标、道路上的一致性，从根本上保证了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和行动规则上的一致性，有着内部团结的深厚基础。但也不能不看到，由于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内仍存在不团结的因素。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搞小集体活动等等，都会损害和破坏党的团结。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党内都存在这种

现象。而党内尤其是执政党内的不团结必然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影响到党的任务的完成。因此，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结合起来，是我们党一贯的做法。首先，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不断对党员进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教育，使他们认识破坏党的团结就是危害党的生命。要求党员干部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注意处理好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地方之间、部门之间和新老干部之间的关系，对各种危害党内团结的现象和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其次，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把党的团结和党与群众的团结联系起来进行教育。强调党的团结是我们团结整个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先决条件。只有我们党是团结一致的，才能团结全国人民，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即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再次，用党本身的历史经验教育党员。我们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解决党内矛盾，以正确纠正错误。每一次党内矛盾的解决，都促使全党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党史上的三次大转变，不仅是道路问题上纠正失误的飞跃，也是党用马克思主义原则解决党内矛盾的范例。对这些历史经验，我们党经常讲、反复讲，让党员从中认识党的团结直接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从而自觉反对宗派主义，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列宁早在 20 世纪初同俄国修正主义派别经济派的斗争中就深刻地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① 我党 70 年的历史经验也表明，党在理论上的提高，是党的领导的正确性、科学性的根本保证。正是由于我们党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保障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路线在党内占居统治地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在

①《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42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党的教育和实践斗争中被不断地纠正和克服。从而，不仅使党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两次飞跃，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还使大量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实现了思想上的彻底改造，具备了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特质。党无可置疑地成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核心领导力量。党在工业不发达国家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功经验，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贡献。它给予我们一条根本的启示：只有结合本国国情深入持久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保证革命和建设的顺利发展，否则，就会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方向，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

当前，社会主义事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挑战。继续加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非常重要、非常迫切的任务。这不仅是挫败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图谋，战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新的机会主义思潮和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需要，也是确保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推向前进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优良传统,借鉴党 70 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成功经验，在全党范围内，在广大干部中，普遍地、深入持久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党同志的马克思主义觉悟和水平有一个普遍提高，进而坚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为中华民族，为世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原载《广西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出版）

（作者单位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校）

大革命时期四川党组织的历史贡献

刘 国 龙

四川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大革命时期，四川党组织(中共重庆地委),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艰苦卓绝,刻苦奋斗,鏖战蓉城，搏击渝州，积极建立和发展共产党团组织，大力开展和扩大民众运动，发展和壮大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和领导著名的顺泸武装起义，从而促进了国共合作的发展，开创了四川革命运动的新局面，对大革命及北伐战争，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一、积极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为党的事业培养和造就大批干部

1.传播马克思主义，播火种于巴山蜀水。四川虽然地处西南一隅，但传播马克思主义却较早。王右木是四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是四川江油人， 1914 年，被选拔为官费生考入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经济系。五四运动期间，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 1919 年夏,他由日本留学回国,到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任学监并教日文。1920 年底，他组织成立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并指导成立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 年，他领导建立马克思主义学会,创办《人声》旬报,自兼社长和主笔,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新思想，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 1924 年春，根据党组织的决定,他出任四川督办署《甲子日刊》主笔,宣传进步思想,发动众参加革命。他是四川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和四川党团

组织最早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在川南，1921 年 10 月，恽代英受党的派遣来到泸州，任川南师范学校代校长兼教务主任，因宣传马克思主义，被泸州军阀张英扣押。当时，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吴玉章，立即打电话给张英保释，并聘请恽代英到成都高师任教。恽代英到蓉后，继续从事革命的教育和宣传工作，他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并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使高师成了成都进步势力的大本营，继恽代英之后，萧楚女于 1922 年夏秋之际，也受党的派遣，来到四川，他先后在四川泸州师范学校、重庆联中、万县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重庆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等任教，并担任《新蜀报》主笔，积极从事革命的教育和宣传活动。他从 1922 年 9 月至 1925 年 3 月，两进夔门，三上渝州，播火种于巴蜀，促进了四川地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创建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巩固与发展，对推动重庆和四川地区革命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通过王右木、恽代英、萧楚女等人的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在四川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广泛传播，为党团组织在四川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建立和发展团的组织，使团员和青年在革命斗争中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王右木奉党的指示，到成都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当时，他从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中选拔部分骨干，于 1921 年 11 月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四川支部”（简称 S.Y），第一批团员有孟本齐、钟善辅、廖恩波、童庸生等人。随后，杨闇公经童庸生介绍，也加入了团的组织。这是四川早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922 年 10 月 15 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童庸生任书记，领导团员积极投入教育界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和择师运动的斗争。1922 年 10 月 10 日，重庆团的组织由上海入团的唐伯焜等人建立，有团员 12 人，组织发展缓慢。同时，在泸州、万县、内江、宜宾、南充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团的组织。这些团组织，虽然成立较早，但尚属幼

稚，组织极不健全，甚至还发生了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缔约的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事情。为此，1924 年 9月 1 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派萧楚女为驻川特派员,授予他‘ 调阅文件,教育同志,整顿组织之全权 ”，萧楚女肩负着领导整顿四川团组织的重大使命，再次来到四川,他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和团结广大团员,揭露和批判了重庆团组织负责人唐伯焜等人的卑劣行径，并撤换了他的职务。团重庆地委则由杨闇公任书记兼组织工作，童庸生负责宣传工作，罗世文负责学生部工作。至此，基本上完成了团组织的整顿工作。在整顿团组织的基础上，培养和吸收了一大批团员。同时，还发起成立了团的外围组织——四川平民学社、学行励进会和劳工互助社。通过这些组织，团结四川广大青年，从而，使团员和青年在革命斗争中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

3.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使四川革命运动从此有了一个统一的坚强领导核心。四川党的组织是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产生的。1922 年 6 月,全国党员共有 195 人，其中，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报告党员数量时，就提到有“ 四川三人 ”。据各方面提供的线索来看，可能是恽代英、王右木、童庸生。随后1923 年 9 月,成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即“ 成都独立一组 ”，其成员有王右木、恽代英、童庸生等人。以后，吴玉章和杨闇公等 20 多人,于 1924 年 1 月 12 日秘密成立了‘ 中国青年共产党 ’的共产主义组织(简称 Y.C),吴玉章、杨闇公等 6 人被选为负责人。不久，他们从赵世炎、恽代英处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纲领、组织原则以及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情况，认为中国共产党比中国青年共产党健全得多、成熟得多,于是,杨闇公、吴玉章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中国青年共产党便宣告解散，其成员按党章规定个别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上半年，党中央为了加强对四川党组织工作的领导，又派遣一批干部来川工作。从而使四川党的组织不仅在城市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还在农村地区许多县里建立了党的组织。

当时“各地党组织分布情况是成都支部——刘坚予，宜宾特支——郑佑之、郑则龙，綦江——陈翰平，江津——戴维师，内江——黎冠英，顺庆——吴季蟠，营山——黄知风、郭竟皆，邻水——陈俊三，合江——黄旭生，达县——张鲤庭、王维舟、张爱萍等”①。这些组织，着重从思想上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注意严格选人“决不滥收同志”，使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这一切，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四川省领导机关奠定了组织基础。1926 年 2 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建立了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作为领导全川革命革命的斗争机构，杨闇公任书记，冉钧负责组织，吴玉章负责宣传。5 月，刘伯承经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重庆地委建立后，党的组织在四川迅速发展起来。地委刚建立时全省只有党员 19 人，到 1926 年 7 月，党员发展到 42 人，8 月达到 120 人，10 月达到 168 人，是全国“发展最快者”之一。中共重庆地委的建立，标志着四川建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从此，四川的革命运动有了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

4. 中共重庆地委为党的事业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干部。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吴玉章、杨闇公等人，于 1925 年 9 月 14 日在重庆大溪沟正式创办了培养革命干部的“中法学校”。该校由吴玉章任校长、童庸生任教务主任，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其设置课程主要有；时事政治、社会发展史、共产主义 ABC、经济学、史地、心理学、英语、法语等。到 1927 年初，中法学校共培养了 1000 多人，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同时，中共重庆地委还为党的事业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治党治军骨干，如杨闇公、吴玉章、王右木、童庸生、朱德、刘伯承、陈毅、冉钧、周贡植、罗世文、黄慕颜、李筱亭、任白戈、王维舟、张爱萍等。这批干部，为创建四川党团组织，

①《重庆文史资料》，第 25 辑，第 9 页。

为开创四川革命运动的新局面和支援北伐战争，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的贡献。

二、大力开展民众运动，开创四川革命运动的新局面

1.开展工人运动，组织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大革命时期，四川各行业工人共有 10 多万人，但产业工人极少，大多数是手工业工人和苦力工人。这些工人“ 散处不聚 ”,且受封建行帮,老板和工贼的欺压、束缚，这给开展工人运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针对上述情况,四川党组织在工人相对集中的重庆、成都、自贡等地,通过组织工人成立劳工互助社、办好平民学社、开办工人夜校和工读校等方式，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觉悟，进而开展各种形式的工会活动。四川广大工人在中共重庆地委领导下，各行业纷纷建立了工会组织，全川成立工会共有 80 多个，工会会员有 1 万多人。随着工人们的日益觉醒，各行业工会为自身的合法权益而展开了罢工斗争。例如， 1926 年 2 月 7 日,重庆 2000 多熟毛帮猪鬃工人为反对老板压低工价、强招学徒而举行罢工斗争 ;1926 年 9 月,英帝国主义炮轰万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九五 ’惨案,成都英国人雇用的华工 600 多人举行了大罢工 ;1927 年 1 月,中共自贡特支，组织了釜溪河畔东西盐场 2 万多名盐工要求井商会和地方政府增加工资而举行的大罢工，等等。这些罢工斗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对推动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2.开展农民运动，掀起抗捐减租斗争。大革命时期，四川军阀、团阀和盗匪是危害农民的 “ 三害 ”。尤其是团阀是开展农民运动的最大障碍。为了开展农民运动，中共重庆地委于 1926 年初从綦江、江津、涪陵、巴县等地选送牛大鸣、黄堂佐等 25 名青年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第二年春又选送 20 多名青年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时，中共重庆地委还印发了告农民书、农民协会章程和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并在中法学校选拔了 63 名党团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